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大师死在疾风暴雨中	老 侯
【亡灵祭坛】	文革罹难者白成海、丁西河	周烽烽
【非常年代】	美女如云，却总被雨打风吹零落去	陶洛诵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三）	吴中杰
【细说从头】	“九一三”回望（下）	余汝信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生逢乱世】

大师死在疾风暴雨中

• 老 侯 •

因制作一个京剧微视系列，于是有了一个发现——伶人演戏不止在舞台。他们台上演，台下也演，甚而，台下比台上演得更精彩。

伶人的世界里，更吸引我的不是戏剧本身，而是大时代背景下，伶人与时代的关系。

最引我关注的是两个名字如雷贯耳的人，一个是马连良，一个是李少春。同为伶人，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两种人，却有着同样的一个归宿。

◇ 先说马连良。

就伶技而言，马连良是天才，其造诣不仅俯视后人，甚而不被他俯视的前人也不多。前后“四大须生”，他都位列其中。1930年代起，南麒北马，各领老生行风骚半边江山。

上世纪整个上半叶，艺人们见多了政权的更替，所以，对政局大多不关心，马连良就是其一。

做老板，他很优秀，走南闯北，游刃有余。但是，纵观各个时期，在大时代政治面前，他的人生抉择，几乎就没有对过。

中国全面抗战，他应邀前往关外，到当时满洲国的地界去走穴。可同时期，程砚秋在北京种地，梅兰芳在上海蓄须。

内战即将结束，人在香港的马连良，同时接获台湾和北京两方面的邀约，二选一，他选择了北京。

1952年，他参加京剧界慰问团赴朝演出，按市价索要演出费，令同行者咋舌。同时期，河南伶人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

这样一个政治上极不开眼的人，当政治风暴来临，下场也就不言而喻了。

艺人普遍坚信“玩意儿”无敌天下，马连良怎么也不会想到，60年代，排练现代戏《杜鹃山》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竟然是一个五号配角——赤卫队员郑老万。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损的招数，能比这样更羞辱一个一代宗师。

这个不关心政治，并远离政治的人，最终没能逃过政治，作为十年“艰辛探索”的开场戏，新编京剧《海瑞罢官》把他卷进政治漩涡。第一批被抄家的就有他。

他哀求红卫兵不要损坏一个价值连城的玉雕，并要献给国家，却最终被红卫兵摔碎在地，他当即晕倒，从那一刻起，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23岁就挑班的马连良，讲究吃穿，出入气派。在当时梨园界，论行膳排场，且精于饮饌者，首推马连良。而政治风暴中的马连良，完全没了往日神采。据一个见过他生命最后时刻的人说，马连良提着一只暖瓶去锅炉房打水，步履艰难，神态迟缓。他对熟人倾诉：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现在鞋都穿不上，是不是要死了？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病歿于心脏病，享年65岁。他不屑政治，但还是死于政治。

◇ 再说李少春。

做京剧微视之前，李少春的戏，我既没听过，也没看过，但这个名字早有耳闻。听说这个有“李神仙”之谓的人，是百年才出一个的文武老生奇才，才气仅次于杨小楼。

前些年去霸州，看到气势恢宏的李少春大剧院和纪念馆，才知道这个冀中小城是他的故乡。

如果说马连良的人生辉煌属于上世纪上半叶，那李少春的应该属于下半叶。

生于1919年的李少春，比马连良晚18年，年龄上，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差距。

人们认为，正是这样的差距，使得李少春失去了创立京剧门派的历史机遇，因为，当他30岁可以创立门派之时，时间来到了1949——这是一个人民艺术的时代，不鼓励个人成名成家。

而李少春也就此走上了和马连良截然不同的道路——名伶马连良与人民艺术家李少春。

政治上，马连良不开窍，李少春可绝对有慧根。

1952年，李少春加入中国实验京剧团，1955年加入中国京剧院，成为京剧一团团长。

李少春要求进步从积极参与京剧改革创新开始。今天，几个京剧史上可以留下一笔的人物形象，最初的创造者都是李少春，如：《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

当然，他进步的表现还是体现在政治本身。

1957年，反右运动，他成为伶界积极响应者，而斗争的靶子是旧时代的伶界大腕叶盛兰。李少春依自己对叶盛兰过去的了解，对叶盛兰展开揭露和质问，最具锋芒的质问莫过于：“我们谁能保险演员不反党？”（章诒和《李少春在“政治压力”下的“政治表现”》）

对伶界过往及人事极为熟悉的章诒和先生说“李少春听从了党的指示和安排，对叶盛兰做了比较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因为在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里，于个人而言，狡诈、残忍、背叛都不是罪恶，是政治性的姿态展示，并成为中国人一项新的求生技能。”

一年后，李少春以反右运动中的进步表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京剧界的党员骨干。

政治上要求进步是认识问题，运动中整人是人品问题。有人说，李少春经受住了历史对他人品的考验，但也有人说，他的那些揭发批判，也足以打断一个心高气傲的名角儿的精神脊梁。

1958年之后，以脾气大著称的叶盛兰再也没了脾气。

1960年代初的李少春，戏红思想更红，但是，“艰辛探索”来了，第一个黑掉的就是业务、思想双红的李少春。

黑，就是当时所说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红得发紫的人民艺术家李少春归于哪一类？

比之于马连良和叶盛兰，李少春的境遇更惨，如果说前者遭受的是精神折磨，李少春还要加上肉体的摧残。

“艰辛探索”一开始，他就被揪斗并挨打，据说，像造反派专打刘诗昆手指一样，李少春挨打最多的是腰，打人的是内行，这是存心要废掉他。

当他的徒弟因扮演李玉和（钱浩梁）、郭建光（谭元寿）而走红，他却只能蜗居一隅，被控制使用。

远离政治的马连良和热衷政治的李少春，却最终走向一个结局。

这是每一个旧时代走来的伶人的宿命，不管是远离政治还是热衷政治，走进上世纪下半叶，命中注定，他们的戏码结局只有一个。

(李少春殁于1975年9月21日,享年56岁。——编者)

2019年6月22日

□ 来源:微信号《老侯说事儿4》

~~~~~

# 【亡灵祭坛】

文革罹难者白成海、丁西河

• 周烽烽 •

近日在CND网站上看到王友琴女士发表的关于文革罹难者林永生(王广平)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中学同学白成海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惨剧。白成海,男,文革开始后改名白血,生前是山东泰安二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自泰安县徂徕公社一个农民家庭,于1967年夏天的某一天只身路过泰安煤炭学校时,被该校造反组织“烽火兵团”的一伙人抓进学校,随后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套进麻袋中用棍棒没头没脑地毒打,二三十分钟后即死于非命。白在被毒打的过程中始终未发一言直到临咽气前说了一句:“我不行了。”

当年我是泰安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见到过白成海但从未说过话。他出名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改名,另一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他是造反组织“红总司”在泰安二中的头目之一且与“红总司”的一号人物张熙春过从甚密。白成海罹难时我并未在场。上述简单经过是听高中二年级同学李俊明说的。据李说,打人时他自始至终在场但他本人并未下手。抓白是因为“烽火兵团”属于“红总司”的对立组织“红卫兵指挥部”。

无论抓白的原因及打他的过程如何,白被活活打死是县城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尽人皆知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造反组织打死,公检法机关不会有任何反应。人的生命变得跟一只蚂蚁,一条毛毛虫一样轻贱。如此血淋淋的世道能是什么好世道!

我还听我父亲讲起过几个文革中在劳改营地死于非命的人。可惜我记住名字的只有一个。丁西河,女,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地处山东章丘王村的劳改农场服刑。因被发现新的反革命言行,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父亲告诉我,丁属于铁骨铮铮的女杰,至死没有低头。在临刑的公判大会上,她被勒着脖子,嘴里还塞着东西。可惜我知道的只有这么一点;而且我父亲也早已去世了。

另一个我父亲提到过的非常惨烈的发生在劳改农场的例子,是有人跳进了烈焰熊熊的窑炉去自杀结果尸骨无存。可惜死者的姓名和身世他也不知道。

我又回想起了两位当年被迫害自杀的人:一位是山东农学院的教授(抑或是副教授),叫王夫之,66年下半年在该院主教学楼的6楼跳楼身亡。王教授的儿子王复生是我的同学。他虽高我四级但我们很熟。我曾请一位同学跟王联系一下(我没有王的联系方式),问他是否愿意把当年的境况写一写。可惜王断然拒绝了。王一家人(母亲,弟弟)于父亲去世后遭遣送至农村。王与一位农村女子结了婚,结果文革结束后还是没资格返城直到他离了婚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安排到泰安县教育局任职。还有一位罹难者是我同学的母亲,姓应,生前是山东章丘幼儿园的负责人,人极和善,68年夏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我这位同学是我和我姐姐的好朋友。虽然如此,当我跟她取得联系并请她写一写她母亲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时,她说要考虑考虑,跟儿子商量商量。结果没有了下文。文革结束都过

去四十多年了。在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文革罹难者的至亲却如此噤若寒蝉，连发声为自己的亲人留下一点记录的事情都不敢做。这样的改革开放，是我们想要的吗？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泰安地区社会福利院。在被收容于该院的三百余名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称为院民）中，受迫害自杀者大概有5人。在被强制遣送回原籍（说是为了备战备荒）的一百多人中，又有数人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自杀。要知道，这三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共建政前就已在该院生活了多年，不少人还是盲人，回到原籍（全在农村）后即便不自杀也是举步维艰，傻子都明白这一点。

福利院是个小单位却是个庙小妖风大的单位。文革中，除去上述被迫自杀者，还有一连串不明原因的自杀事件。66年冬天，在果园工作的一个技术员上吊自杀。此人自称姓王，当然也有个名字，东北口音，讲话细声细调，人也非常低调，但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来历。人们都说他是被文革的风声吓得自杀的。他的尸体是被少年郭希水发现的。郭是孤儿，人很白净，个子高高的，一点脾气没有，曾得过肺结核，所以不用参加劳动，也不参与文革。可是大概在72年，这样一个看起来文文弱弱，与世无争的人，也莫名其妙地上吊自杀了。秦玉芝，地主家庭出身，40多岁，院民，以干净利落被人称道。文革中期，经人多次劝说，嫁给了根红苗正的院民食堂炊事班长刘泰和。可是，只过了两年多，秦就自杀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刘泰和也自杀了。文革后期，福利院的自杀身亡者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叫王会清，中共党员，职工，赶马车的；另一个是刘某某，职工食堂炊事员，探亲后再也没回福利院。其尸体后被发现于返程途中的一口井里。

泰安福利院由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于1931年募捐创立。中共建政后，福利院归民政局管辖。文革中，泰安地区民政局干部郑新道成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郑在福利院的代理人刘衍朴，刘培泉，鼓动福利院的院民造反。造反者中，为首的叫从相海，尚未成年；仆从崔来泉，缺一根胳膊，诸春明，缺一条腿，祝炳臣，侏儒。这几个家伙在文革中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我曾遭受他们的殴打不止一次，也亲眼看见他们毒打老弱病残的院民。盲人解玉祥，就因为常去我家串门儿，有时跟我下下棋，吃了我的挂落。造反派逼我说出母亲的下落时，竟然把解玉祥作为陪绑。几个恶魔围上前去，劈头盖脑地扇解的光头，直到大概是感到自己的手也打疼了才住手。文革中期，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福利院。从相海被送去参军但又很快复员；崔来泉，诸春明被遣送回农村原籍；祝炳臣本来就有城镇户籍，所以离开福利院落户在泰安县泰山区。而被他们逼死的院民们，恐怕将永远冤沉海底了。众多的莫名其妙的自杀（或是他杀）事件的原因，估计也将永远尘封于世了。

□ 原载《华夏快递》2019年9月11日

~~~~~

【非常年代】

美女如云，却总被雨打风吹零落去

• 陶洛诵 •

“文化大革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未被算进种种的损失之列，即美女资源的浪费。

后来的革新政府、民族精英，从来未见到他（她）们谈论、研究这个问题，哪怕是一句话：“对不起了，美女们，我们忽视了你们的存在，浪费了上天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对你们倍加珍视才对。”

中国的人类学家应当补上这一课，列专题项目研究文革中美女的遭遇与损失，这定是个引起轰动的课题。

“青春即是美”，这个命题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女性中的佼佼者，我们都可以称其为美女。青春以什么年龄为上限？有人说二十五岁，有人说三十五岁，还有一种说法至六十五岁，我个人的看法，只要尚存青春活力，就可以算作青春常在。

我们那一代人里没有歌星、影星，刘晓庆、陈冲、张瑜等人都比我们那代人小（她们也只不过寥寥无几）。我们在二十岁左右，全都被赶到乡下去了，粗糙、笨重的体力劳动，恶劣卑下的社会地位与生活，西施也会脱层皮。

在社会生活一片愁云惨雾中，美女们依然存在，顽强地活着，追求着美女们天经地义应当追求的目标——情爱与欢乐的生活。

我认识两个美女，在文革爆发初期，仅仅因为出众的美丽，而惨遭修理。

一位叫李领弟。领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初中同校不同班，没考高中，直接上了个中等专科学校。她家原是正黄旗，住在一幢高门大宅里，屋里的摆设全是电影里看到的清朝宫殿模式，落地自鸣钟就好几座，到钟点时，从各个屋子里发出美妙的齐鸣。与她初中同班的曙辉告诉我：“领弟因为长得美，‘红八月’被红卫兵当流氓给打了。”这叫什么逻辑，美丽有罪，还是打人犯法？世界的颠倒从此开始。

一位叫林萍。萍本与我家是斜对门的邻居，小时候的玩伴。萍的父亲原是旧海关官员，家境富有。后来我家搬走了，再与萍相遇则是在北海公园的冰场上。萍天生丽质，自小就梦想当电影演员，不断给电影制片厂寄照片毛遂自荐，电影制片厂也颇为重视，回信叮嘱她好好学习，一有机会就准备起用。“文革”爆发，萍被剃了个阴阳头，即一边有头发，另一半剃光，明星梦成为昨日黄花。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文艺界是重灾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认识一位导演的女儿，名叫小妹，认识她的过程就有戏剧性。

我家胡同口有一食堂，几经改朝换代，几经易主。2001年我回国探亲时，它终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白魁老号”。小妹当年在那儿卖啤酒时，它叫回民食堂。小妹身材窈窕，浓眉大眼，充满现代都市女性美，相当扎眼。她服务态度不能说好，有人拿瓶子去买酒，她用啤酒升量好，一推酒升了事。买者说：“请帮我灌进瓶里。”她一挑眉毛，眼睛一瞪：“你自己不会倒？”因她年轻貌美，顾客多不与她过于计较。

我奶奶因骨折住院，与小妹的母亲同病房，她母亲看我们全家不遗余力轮流值班照顾奶奶，大为赞叹，我和小妹遂成朋友。

小妹喜欢讲这段故事：

“我爸爸是北影的导演，文革中被关进牢房，被释放后我爸用全部的钱给我买了块巧克力糖，到我工作单位来找我。我看见他，第一句话是没好气地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爸一听楞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解决了，解决了，快解决了……’我因为他的问题在学

校受尽歧视，我们七二届初中毕业生，有百分之十五允许上高中，我连红小兵都没入上，更别说加入红卫兵，先分配我卖肉，后来托人才调到食堂的……

你想我爸见我那态度心里得多难受啊，哎，我那时候是真不懂事。”

我认识小妹是1975年，她爸回到北影厂了。她家在灯市口妇联宿舍分到一套房（她母亲是妇联干部），许多演员都上她家拜访，她说：“演员主要靠化妆，刘晓庆大崩头，近视眼，腿也不长，可化起妆来就挺好看。”

与小妹私交最好的是文革前演过几部片子的影后杨雅琴。她演的《苦菜花》里的娟子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苦菜花》是部队作家冯德英的一部小说，是文革前畅销书之一。讲的是一个农家妇女带着几个孩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杨雅琴是在部队里长大的孤儿，演这种片子驾轻就熟。

杨雅琴没有大牌明星的架子，经常到回民食堂找小妹，等小妹下班，她的到来总能引起人们的围观。

因为小妹，杨雅琴认识了我。一天，她来到我家，和我面对面对坐着。明星的确不同凡响，除了身材高矮胖瘦适中，线条玲珑起伏外，最吸引人的的是她的脸，好像是精雕细刻出来的，像古希腊美女，让人崇拜的一种古典美。我问她多大了。“三十四岁”她娇声答道。

杨雅琴当时是单身，我和小妹热心地为她张罗对象，邢弘远知道后说：“这岂不是像夏梦在让你找对象吗？”

我这方面的天赋是偶然被广大群众发现的，或是应广大群众之需要而被激发的。

我和赵京兴在1977年春节举行婚礼，因为朋友多，婚礼进行了三天，除赵振开、赵振先兄弟等老朋友外，还有我进银行结识的新朋友小左和小胡。他俩带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三十岁的郭某，是他俩的师傅，他们说让我帮他们师傅介绍个男朋友。无巧不成书，我指着墙上一首镶在玻璃框里的诗，说“这首诗是李宝臣写的，请一位书法家用汉隶砖瓦文抄的，是对我们结婚的贺礼，送来时，李宝臣说让我留心为这位书法家找一女友，书法家亦三十岁，四中毕业。”

我说这话时，对这位书法家尚未谋面，现在我连这书法家的姓都不记得了，女的我还记得叫郭爱勉，我就这么一牵线，他俩还真成了。恋爱后结婚，生了个大胖小子，听说最近送这孩子去英国留学。这不叫缘份叫什么？

我的大名不径而走，我亦乐此不疲，这样的好事我不知做了多少。我这一爱好也是中华民族许多人的爱好，大家都爱当红娘成人之美。

有次振开去我家送书，他借给我一本《卡萨布兰卡》，讲的是二次大战一间谍的故事，被拍成过电影。当时正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女在我家，她文革前是兰州某文艺团体的歌唱家，文革中失去了丈夫，带着一个周岁的孩子找了位北京某机关的小翻译，小翻译与我弟弟是朋友，当时大家一致抗议（包括赵京兴），他们所有的朋友见了我就都变成了我的朋友。

歌唱家正和我聊天，温文尔雅的赵振开进来了，振开听说美女是搞声乐的，邀请她唱支歌，美女害羞不肯，驾不住振开一再恳求，遂唱了一支古巴民歌《鸽子》。歌词是这样的：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那么地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洁白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就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要和你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飞翔……

美女一直低头羞羞答答地唱，唱完后余音绕梁三日不走，振开的评价却出乎我的意料，“挺浪的。”他用特有的富有磁性的声音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算什么评价？但语气里的赞叹是不容置疑的。

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一位绝色美女叫圆圆，她妈和我妈同一个教研组，都是女十三中的老师，她爸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她姥爷是毛选第四卷里经常被提到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司令长官孙连仲。她妈妈孙阿姨就甭提长得多么标致多迷人了，我从小就崇拜美女，孙阿姨是我崇拜的人之一。

圆圆身材修长，细细弯弯的眉毛，黑黑的左顾右盼的含情目，细白的皮肤，脸颊上两朵玫瑰云。牟志京坦承不敢正眼看她，因为太美，使他自惭形秽。

圆圆一直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文革前是个共青团员，文革中是个逍遥派。毕业时，特别走运的是学校里的工宣队没逼她上山下乡，她说话细声细语，“没人逼我，一逼我我准去，我一点也抗不住。”

她被分配到西城某理发馆当理发员，被不三不四的小伙子们发现，“小庙里来了个仙女”，整天到理发馆捣乱，理发馆快开不下去了，领导无奈，这才把圆圆调到后面当会计，藏起来。

像圆圆这样的美女难道不是巨大的浪费吗？我看她该成为影后才对。

圆圆后来去美国，嫁给个医生为妻。

文革中像圆圆这样的美女又何止百万？千万？我哀叹我们这一代美色没能人尽其用，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

（作者简介：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定居悉尼。）

（原标题：美女如云）

□ 摘自作者回忆录《生之舞》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三）

• 吴中杰 •



(上接 z k 1 9 0 9 c)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 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 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 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转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 ▲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张春桥的指示，为反“逆流”运动定下了调子：一是说明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要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也就是说，要大张旗鼓地加以整肃；二是把打击目标集中到少数头头身上，鼓励红革会战士从内部进行造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

当时，上海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在复旦，“炮打张春桥”的头头也集中在复旦，于是复旦的运动就进入了反“逆流”阶段。

开始，是发动各造反派组织的群众从内部反。红革会内部成立了“新复旦红革会临时接管委员会”，接管了原红革会勤务组，并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红革会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红三司连日召开整风大会，统一思想，连续发表声明，表态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批判炮打头头。连顶得很厉害的东方红公社，也发表了《坚决执行五点指示的声明》。于是，对于“炮打”头头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开，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就像不久前他们批斗“走资派”一样，有些人身上也被挂了牌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但过去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见风水之轮转还是需要一些时日的，现在这一转，只有一两个月之隔，实在有点使人眼花缭乱。

但造反派毕竟是一起冲杀过来的，他们自称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且这些头头们既建立了威信，要从内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许多群众并不认可新头头，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只不过是乘机捞一把，故谓之曰：“捞稻草”，常常用大字报或漫画加以讥讽。即使被树为全市红卫兵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司令陈敢锋，也不被老红卫兵所看重。在张春桥们看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只有一个陈敢

锋没有参加炮打，难能可贵，所以将他作为红卫兵唯一的代表，安排为市革会委员，后来又提拔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陈敢锋之没有卷入炮打事件，纯属偶然。在炮打誓师大会之前，他曾问过安文江对炮打的态度，表示要跟安文江采取同一步调，但陈敢锋外号叫做陈看风，一向投机，安文江怕他临阵出卖，没有告诉他真情，倒是保全了他。所以陈敢锋的没有参加炮打，并非有什么“坚定的立场”，而是不为人所看重的结果。

既然造反派对于老头头总还有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台上有时批斗得很激烈，而台下却对他们还是很照顾，而新头头却树立不起威信来。对于这种情况，张春桥们当然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不能斗倒老头头，而且也无法开展工作，必须派人下来整治才行。于是，在3月4日红革会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派郭仁杰回到复旦主持工作。

郭仁杰所主持的工作，当然是反“逆流”工作了。

但这是一件极其难办之事。上海的红卫兵虽因“炮打张春桥”而受挫，但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刀势未老，锋芒犹盛，毛泽东也尚未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红卫兵运动虽然招怨，但《人民日报》在4月2日还是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指出“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且针对那些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人说：“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要郭仁杰来主持针对“革命小将”的反“逆流”工作，无疑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但郭仁杰还是兴冲冲地来了。因为他这次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一言九鼎，威风凛凛。

郭仁杰一到复旦，照例少不了许多捧场的。不但想做官的围着他转，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说得郭仁杰乐滋滋的。哲学系的“八一铁军”战斗组贴出了拍马的大字报：《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杰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都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还接连不断，捧得郭仁杰有点晕晕乎乎，根本就听不进不同意见。

而在复旦，反“反逆流”的力量却非常强大。开始是暗中抵制，但很快就转为公开对抗。

“过河卒”率先贴出大字报：《在转折点上》和《再论在转折点上》，他们根据《红旗》杂志近期发表的《关键在于大联合》、《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和《论革命的三结合》等社论精神，认为目前的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狠抓干部问题，为革命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而“反逆流”斗争应当服从这个大方向；同时还批判了“复旦情况特殊论”，指出那种借“反逆流”来打击革命小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贴出了呼应的大字报，“金猴”在《我们的看法》中，提出了“对我校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全面否定郭仁杰的做法，并指名要郭仁杰就“过河卒”的大字报表态；“迎春花”则贴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我们老造反要讲话》等大字报。一时间，抵制“反逆流”斗争的言论和大字报充满复旦园。

但郭仁杰根本不把这些意见放在眼里，他在登辉堂公开向全校师生员工宣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要过万重山。”并且在私下里布置，要揪“过河卒”的后台。这样，事情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在权势的影响下，当然会有人出来呼应郭仁杰，比如，化学系就出了个“轻舟”战斗组，写出《“轻舟”要过万重山》的大字报，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是照着郭仁杰的调子唱歌的；但被讥为“猿声”的人们却被激怒了，由胡守钧挑头，包括“过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内，组织起一个“八·二五串连会”，八·二五者，纪念1966年8月25日戏剧学院大串连也。

阵势已经拉开，双方处于公开顶牛阶段。

开始还只是在大字报上表态、呼吁，后来发展到在会场上抢话筒辩论。在“史红”战斗组1967年5月编印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里，还保存着一份《郭仁杰“五·三”在复旦大学大礼堂的报告》记录稿，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实况。现摘录一段如下：

……今天下午，晚上，星期五一天，安排时间对四月份工作作一总结，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法对四月份作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考虑。（戳一枪：总结不出来怎么办？）为什么总结不出来？当然做得出来，做了工作就总结得出来，不做工作就做不出总结来。（戳一枪：那么只能少数几个人总结，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事情做。）大家一起来总结，从小班开始，（吵……大会主席：请大家不要打断，有什么意见，老郭讲好再提。）全体同志都可以参加这个总结，希望总结不要发展无原则的纠纷。（胡守钧插话：请讲清楚一些，什么是无原则纠纷？）有人要搞无原则纠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原则纠纷就是无原则纠纷，其实大家心中有数。（王志惠：据说有人问老郭，什么是老保翻天，老保翻天就是老保翻天。吵……）大家自己心中有数，可以自己考虑，为什么一定要讲？（哄笑）你以为我是搞无原则纠纷，你也可以指出来。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戳一枪：那么辩论！）有一定时间给大家辩论嘛！现在让我讲完好不好？（戳一枪：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四月份的工作估计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现场上还有更激烈的辩论场面，胡守钧辩论得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但这份记录稿上没有写出，不知是记录者的疏漏，或者是发生在另一次大会上。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顶牛状态。

不过要说郭仁杰根本不抓三结合问题，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乱，他一会儿成立“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一会儿又成立“反逆流指挥部”，总之是想撇开原来那些造反派头头，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能听他指挥的权力机构，但是处处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结合的一方必须是原来的干部，即所谓“革命干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干部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选择，而是由他自己选定一两位进行结合。可惜他选得并不理想。

他的首选对象是原党委副书记葛林槐。平心而论，郭仁杰作此选择是有他的理由的，并非如对立派所指责的，纯属私人交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葛林槐并非杨西光的亲信，认为可以分化出来。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执，而且办事很小家子气，这样就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委里是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

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细说从头】

“九一三”回望（下）

• 余汝信 •

（上接 z k 1 9 0 9 c）

六、对“九一三”过程的重组

叙述“九一三”过程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窃以为，最值得重视的是邵一海的两本书：《“联合舰队”的覆灭》（1988）及《林彪“9·13”事件始末》（1996），两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另为王海光长达八万字的《“九一三”事件循时考》一文，该文的节录版收在《“九一三”回望》一书中。邵、王著述的最大特点，为均重点引用了当事人林立衡写于1971年9—10月间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对研究者重组“九一三事件”过程的重要性，是我们在这一两年才察觉到的。在2013年出版《“九一三”回望》时，我们只能见到林立衡、张清林1980年写给中纪委的一份关于“九一三事件”过程的材料，今天我们才发现，这份材料与《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相比较，在真实性方面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基于现有的材料（尤其是《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我们认为“九一三”已经并非是一个永远破解不了的谜团。相反，这一事件的发展脉络，今天看来已经是比较清晰的。

以下是依据林立衡《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黑体字部分）及其他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张恒昌、陈占照等）回忆等可以相互印证的第一手材料，对“九一三”过程的重组叙述。

▲ 9月5日

深夜，于新野打电话给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打探消息，记录了顾给他讲的毛泽东谈话要点。第二天，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来电话要顾同舟整理一份文字记录稿送来。

▲ 9月6日

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长沙到武汉访问，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李作鹏回京后，将毛在武汉谈话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要他们不告诉叶群、吴法宪。黄永胜当晚就告诉了叶群。

下午，周宇驰驾驶直升机从北京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顾同舟给于新野讲的毛泽东同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要点。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顾将毛泽东谈话整理出来送到北京。

叶群晚上给林立衡打电话，要她带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未婚妻张宁明天来北戴河。林立衡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发脾气说：“你这么大的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断气了，还没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病就会好了。”林立衡只好同意了。

▲ 9月7日

林立衡、张清林、张宁、杨森（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副处长，随卫林立衡）上午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1时20分抵山海关机场。

中午12时，林立衡一行抵北戴河林彪住地。去见叶群前，林立果找林立衡谈话，让刘沛丰守着门，当着周宇驰的面对林立衡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晚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林立果还说：“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林立衡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主任干了许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还要林立衡在林彪面前帮他说说话，说如果情况紧急，她也得跟着跑。林立衡表示同意。这是林立果第一次告诉林立衡要逃跑。随后，林立衡、张清林、张宁见过叶群。林立衡把林立果说的情况告诉了张清林、杨森。他们都很紧张。

下午14时许，林立衡、张清林、林立果、张宁一起去见林彪、叶群。时间约十多分钟。林立衡未向林彪求证林立果所言的真实性，更未向林彪请求阻止林立果的行动。

见林、叶后，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更详细地说了他的计划。林立果讲：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开三中全会批判叶群“夫人专政”，还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批叶群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他最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首长身体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把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现在，黄、吴、李、邱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总理现在也跟江青一边了，来告急说要保副，怕保不住了。叶群要跑到苏联去当寓公。林立果还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重用文人整军队。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将来肯定要打内战的。主席一贯好政治冒险，58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林立果吹牛说：“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现在不止空军听他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部队。林立果还说：跑出去有把握，他能控制住34师，可以瞒着吴法宪要胡萍调动飞机。可以跑广州，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不行了随时跑香港。也可以跑苏联。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40分钟就能到苏修，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有三万美金存在国外。他已经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联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林立果说这几天他都没睡觉，像做梦一样。还试探地问林立衡是否要跑，并说，实在要跑，你也得走。

期间，张清林、杨森担心她出事，让8341部队姜作寿大队长去56楼查看林立衡回来没有，还找到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刘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刘不敢相信他们的话，即找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李文普汇报。李文普根本不信，说不要听他们的，没那回事儿。林立衡回来后，批评张、杨沉不住气。晚上，林立衡找刘吉纯去，问他们都给你说了什么，还问你给别人讲了没有。刘吉纯没说已告诉过李文普。林立衡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坏

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还说：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日还要上天安门。等过几天再说。刘吉纯与林立衡商定，她在里，刘在外，密切观察动静。

晚饭时节，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我准备回北京一趟。

▲ 9月8日

上午，林立果又告诉林立衡：“我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出动，干掉他！”

林立衡吓了一跳：“江腾蛟不怕死吗？”

“江腾蛟对毛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林立衡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林立果：“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就在北京毛家湾。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政治局委员一个个骗来，不服从的就干掉。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林立衡说：“这个方案失败了呢？”

林立果说：“那我们就逃到苏联去。”

林立衡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愿意跟你干的，都是有野心的人。将来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林立果说：“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

林立衡又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林立果说：“他也同意。”

在他去飞机场回北京前，又过来给林立衡说：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了，他要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

当晚，林立果回到北京。

林立果回京后，可以证实的是做了两件事：1.策动关光烈（127师政委）用火焰喷射器解决钓鱼台问题，关推说部队调动程序复杂，办不了；2.策动鲁珉（空司作战部部长）用轰炸机炸毛的专列，鲁听后回家用浓生理盐水把自己眼睛搞红肿住院，亦没有办。

▲ 9月9日

下午，林立衡找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说：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现在情况很反常，你们要注意一点，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报告她。内勤说：林彪前些日子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与叶群、林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李文普了解北戴河的情况。李文普讲：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她放心。

林立衡找刘吉纯了解情况。刘说：林彪要他去大连看房子，叶群不同意。叶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东西来。还说周宇驰从来没有到过林彪处。林立衡意识到，林立果7日的谈话是骗她的，将林立果走前讲的情况告诉了刘，要他提高警惕。

下午17时，顾同舟让他妻子乘34师的飞机到北京，给林立果送毛泽东与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顾同舟按照周宇驰6日晚的电话要求，于7日借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的笔记，花两天时间整理出了一份广州军区毛南巡讲话吹风报告会的详细文字记录稿，长达50页。8日夜，顾给周宇驰写了一封关于报告会的信）。

▲ 9月10日

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到林彪处谈话。林彪说要全家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林立衡仍然未向林彪求证林立果所言的真实性。

9时许，林立衡找到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说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可能要逃跑，要他俩提高警惕，想法偷听他们的谈话，告诉她。陈、张说林立果、叶群和林彪谈话的情况很秘密。并告她：周宇驰来北戴河肯定没有见过林彪。

晚22时许，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到空军招待所。林立果、周宇驰同他们专门从洛阳叫来的43军127师政委关光烈密谈。林立果说：现在上头斗争很激烈，要开人大了，开人大之前要开三中全会，找你来是请你调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他给关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夹子中的林彪“八九”手令。关说：个人调不动部队，必须要总参下令才可以调动。林立果说，黄永胜再过几天也没权了，我们都不敢找他。

当天，林立衡与刘吉纯碰了一次头，没发现新情况，只听说去大连。

▲ 9月11日

上午，林立衡给内勤陈占照、张恒昌谈了关于最近叶群的反常活动，让他们偷听林彪、叶群谈话。

晚18时左右，林立衡找陈占照，说林立果阴谋暗害毛主席。要他提高警惕，不要害怕，发现情况，立即告诉她。

林立衡与李文普谈话，李说：林讲这次坐飞机要看地形，在空中转两三个小时，人不要带太多。叶群说这次到大连不带秀才，部队少去一个中队。林立衡问李：叶群和林立果会不会跑。李答：叶把东西退回北京不少，忙着在十一后在北京办婚事。现在没有什么迹象，有事情他负责。

▲ 9月12—13日

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

12日上午，林彪给李文普讲，准备去大连。

15时多，叶群叫林立衡、张清林去见林，突然要他们当天结婚。因林立衡强烈反对，改为订婚仪式。叶群让李文普给林立衡、张清林照订婚相，并与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16时，林立衡给李文普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首长（指林彪）搞走。要李文普给林彪讲不要上飞机。李文普说他没有理由不让林彪上飞机。

下午17时叶群从林彪的客厅里谈完话出来，遇到张恒昌，对他说：“明天早晨6、7点钟我们去大连，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走的早一些，天气不热。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近18时，林彪给李文普说，准备明天早上去大连。同时告诉叶群通知周恩来，他要坐飞机“运动运动”。叶群也给内勤说要明早走。晚饭后，叶群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仪式。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和《假少爷》，以示庆祝。

19时40分，256号飞机载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两个女兵从北京飞山海关机场。抵北戴河后，林立果很紧张地与林彪、叶群密谈。林立衡安排内勤陈占照、张恒昌偷听。张恒昌偷听到叶群、林立果想往香港跑的话，马上报告了林立衡。

▲ 林立衡的回忆（摘自《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我向8341部队张洪（9）副团长、于仁堂副大队长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说：“你先回去吧。”

我先到56号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然后一起上96号楼。

这时还不到11点。我又去看电影，并叫杨森掌握一辆汽车，外面等着，随时好用。

到了放电影的地方，我把情况告诉了张清林。张清林说，我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张清林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我们正说着，叶群的卫生员小王来叫我：“主任要你马上去。”我对张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他们。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杨森跑到部队去报告。”

走进叶群的房间，我看到叶群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两眼通红，直瞪着我。我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

我问：“明天早上几点走？”

叶群凶狠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走吧！”

我出来，把叶群交代的话通知了张宁。张宁问我：“林立果送给我大蛋糕带不带？”我说：“随你自己吧！”

没多久，林彪的内勤小张匆匆跑来，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突然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我赶快去找李文普。

这时，李文普正在打电话，在场的还有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见到我进来，李文普主动对我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吉纯去大连打前站了。我想给大连打个电话，没打通。”

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来劝一下。”

李文普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我就问：“你们带枪没有？”刘吉纯说带了，李文普说没有带。我说：“到这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

李文普就去拿枪。我说：“你们不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

我从那里出来，碰上了林立果。我就问他：“现在怎么样？”

林立果说：“现在就走！……”他边说边往林彪那里跑。

我回到放电影的地方。这时，电影《假少爷》快要演完了。我看到秘书李春生正在看电影，便告诉他，林彪、叶群今晚要跑，叫他注意点。随后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并要杨森在门口控制住汽车。

这时，叶群突然跑来，叫喊道：“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不去大连了，留下来看东西。”她一边叫喊，一边慌张地在走廊里来回乱窜。

我故意上去问她：“张宁问，她的蛋糕还没吃，要不要带走？”

叶群发火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我一把，她就走了。

我连忙跑出来，看到8341部队的姜大队长守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示意。随即和张清林、张宁一起，坐上杨森控制的那辆汽车，到了56楼。我叫张清林留在56楼，防备林立果来找我，好应付。我和杨森跑到58楼。

杨森马上把8341部队张副团长找来，我对他说：“他们现在就要跑！”

张副团长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报告。我把电话抢过来、直接向他报告情况。

正说着，一名战士跑来报告：“有一辆卧车从96号楼开走了！”

我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耀祠叫查一下是什么车。

这时，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从96号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坐着杨振刚开的车走了！”

差不多同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了几声枪声。张副团长慌忙跑出去。我又立即把听到枪声的情况报告了张耀祠。

张副团长很快跑回来，也给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跑了，没有拦住，李文普被打伤了！”然后对我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了？我马上去追！”

说着，他气喘嘘嘘地带上枪走了。

23时55分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在96楼上汽车。林彪大衣、帽子未带，自己走上汽车。据李文普说：林彪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答：很快就到。

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六中队中队长肖奇明等人在58楼门口马路上拦车，汽车急速而下，没能拦住。在汽车开过100米后突然停下，李文普跳下车来，车内向他开枪，李负伤，开枪射击车门。中队长肖奇明见状，向车上司机开了两枪，对防弹车玻璃无效。警卫部队追至距离车7、8米处，汽车门没有关上又开跑了。以每小时100多公里速度向山海关飞机场疾驶。

听到门外枪声后，张宏、林立衡相继在电话里向张耀祠报告了林彪等人跑的情况。张耀祠要张宏赶快去追，张宏等马上赶了出去。林立衡请求张耀祠调部队从机场反方向阻截汽车，张说：现在是总理直接掌握情况。

张宏带人乘一辆吉普车，姜作寿率8341部队30多人一辆大卡车向机场追去。肖奇明带6、7名战士乘吉姆车追赶，零点13分有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由东向西开，到机场时，三叉戟飞机刚刚起飞。

林办刘吉纯、宋德金、李春生、张恒昌拉着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也直奔山海关机场。到达机场时间早于张宏的车，但飞机已经起飞。

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13日0时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到机场停机坪距离百余米）。

13日0时22分，3位机械师为飞机做完了起飞准备，油车刚到场准备加油时，林彪汽车疾驶停到飞机左后方。第一个下车的是叶群，第二个是林彪。他们顺着飞机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爬上的舱门。刘沛丰先上机，林彪没戴帽子，跟着叶群后面爬上的飞机。潘景寅从调度室径直登上飞机。邵起良给调度室打电话，催促机组人员到场，随后登机。林立果最后一个上飞机。待剩下的机组人员出来时，飞机已经强行滑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追赶的8341警卫部队随后几分钟到场。飞机滑行灯未开，机舱门未关上，紧急启动，迅速滑出，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盖口。13日0点3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强行起飞。

以上的过程叙述至少可以说明：

- 1.林彪的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深感到毛泽东南巡讲话已使其政治生命了结，甚至连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加速了外逃的行动步伐；
- 2.林立果与林立衡的谈话表明，外逃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一致抉择；
- 3.林彪出走时是清醒的，他自己走出住处，自己沿工作软梯爬上飞机。

七、蒙古官方关于林彪专机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1971年11月2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我在2015年从国外一所研究机构获得了这份以斯拉夫蒙文（西里尔字母蒙古文）打印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并请斯拉夫蒙文专家译成中文。根据调查报告，于2016年3月31日在《南方周末》第1675期公开发表了《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一文。

该调查报告共18页，其中16页为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坠机现场的详情；第二部分为“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第三部分记述了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资料、物件；结尾两部分为“结论”及“建议”。调查报告最后两页为“在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件清单”，并附有照片多张。其第一部分首段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2时2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架编号为256的飞机，坠毁于东经111度15分，北纬47度42分，也就是我国境内肯特省伊德尔莫格苏木，名为‘苏布拉嘎盆地’的一个地方。”

“结论”部分称：

1.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涂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足以证明这个结论。

A) 给飞行员下达的书面指示中，提及“中国空军第三十四师司令部”字样。与此同时，加油收据记录册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3556部队”，每一页均盖有“3726部队”的印章。飞机技术服务文件、使用说明及其它文件（Q一码，地图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或空军司令部制作，还有给飞机乘员发的那些证件亦来自军队。除了所有这些印章、标志和机组人员的身份证件这类具有军事内容的资料之外，在此飞机上找不到任何与民用航空运输、以及与民用机构或组织、或与民用工作相关的个人有关证据。

B) 非常清楚，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机上人员都是军官。由他们的着装、个人携带的武器弹药（枪支，军服碎片等），编号为0142、0143的军官身份证，参考数据如3726部队、7196部队，3726部队第三大队邵起良，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等军队番号或记录，均足以证明上述判断。

C) 该飞机原用于民用航空运输，后为军用目的而进行改装，拆卸部分乘客座位，增设一些用于军事目的的新设备。除了正常的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器和其它控制设备以外，机上又增加安装了“Ekho”雷达、“PB—YM”无线电高度测量装置，这些设备均由苏联制造。蒙古和苏联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该飞机上安装使用苏联制造的无线电测量装置，目的是为该飞机的低空、超低空、高空飞行作准备。

2.该编号为256的中国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此结论由下列证据证明：

A) 该飞机安装有诸如导航雷达、气象雷达、无线电电台设施、高度测量仪等现代通讯导航设备和用于防卫的相关设备。与此同时，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

B) 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和纸张均表明，在最近几个月，该飞机曾经进行过多次夜间飞行，到过中国南部、北部、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备用机场。记录显示，每个人都接受过很多训练来学习备用代码表及其解决方案、军用机场的经纬度位置、降落地区的地图、各种关于如何使用信号在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之间上空进行联络的说明。机组人员中包括有可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即使没有技术支持也可以使飞机在机场强行着陆的专家。飞行员受过良好教育，在飞机上携带武器，以便在遇到袭击时进行防卫。

C) 蒙古官方天气预报提供的数据显示，1971年9月12日、13日、14日，我国东部和南部天气晴朗。该三叉戟飞机安装有现代设备（PLS级E190气象雷达，该装置

提供了全天候日航及夜航的可能性），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绝不可能失去航向，特别是它在进行低空飞行。甚至在事故发生30小时后，中方都没有查询他们的这架作为“失去航向”的飞机的踪迹，也没有与任何无线电站联系。上述事实完全与中方所声称的该机因“失去航向”而坠机的解释相矛盾。

3.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这个结论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

A) 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 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100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 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 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以上证据，驳斥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根据调查报告，我对林彪专机坠毁原因作了以下几点辨析：

（一）蒙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调查报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少将），成员桑加（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上校）、高陶布（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根登达日扎（职务不详）、达希泽伯格（法律专家）、云登（民航局专家，少校）、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和莫尤（法医）。调查委员会九人中，除图门登贝尔勒、根登达日扎外，其余七人在1971年9月15日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等一道到过坠机现场。（10）

调查委员会虽然囊括了各方面专家，惟从以上已知八人的职务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偏低规格的临时班子。这似乎可以说明，蒙古官方对于中国256号飞机坠毁一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

调查报告虽然承认蒙方“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但苏联专家并非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从《调查报告》用语中我们可以意会到，蒙方将其与苏方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考虑到当时苏蒙两国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排除苏方在调查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但类似“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11）这样的传闻，在《调查报告》中得不到印证和支持。

（二）坠机现场发现的尸体和枪支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叙述了蒙方在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发现的机上乘员遗体及所携带枪支的情况。

《调查报告》称，“距坠机点南侧500米处，我们开始检查工作。在那儿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其他散落的尸体之间相隔约3—15米。所有尸体分布在50×20米范围内不同位置。所有的尸体都被烧过，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一共有9具尸体。”

《调查报告》接下来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这些描述与孙一先的描述相比较，更为简略。从对尸体描述的细节可以推导出，除第8号女性尸体外，《调查报告》的尸体编号与孙一先所述编号有所不同。

《调查报告》称在坠机现场发现手枪七把、折叠式冲锋枪一支。这与蒙方在1971年9月16日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稿的叙述是一致的。（12）根据机上乘员人数及枪支数量推测，机上乘员除林彪、叶群外其余七人都可能有佩枪（除非林立果、刘沛丰两人有多支佩枪），惟九具尸体均“身体外表正常”，没有异常的枪击痕迹。机上乘员俱为飞机坠毁过程中摔撞和被烧而死亡。

《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间接地驳斥了坊间的众多不实传闻，如其中之一：“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遗体整理出来，发现遗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13）

《调查报告》同时证实：直至1971年11月20日，苏蒙方面对256号飞机乘员的真实身份仍然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孙一先如下一些说法。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14）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遗体进行检验。……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遗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15）

《调查报告》实际上更否定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顾达寿在其口述回忆中的一些说法。顾达寿声称，1971年9月间，“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获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故特别指定让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16）

（三）蒙方判断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拥有，用于军事用途（略）

（四）蒙方误判256号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略）

（五）《调查报告》认为飞机坠毁原因是飞行员所犯错误所致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3点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此结论由4点事实支持。

“九一三事件”后大半年，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作出的报告认定：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17）

王海又称：“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18）

中蒙两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主要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惟降低航速、放尽燃油才迫降，是潘景寅独自一人也能做到的。作为富有经验的资深飞行员，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中国空军专家组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六）《调查报告》完全否定了“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无论是蒙方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或中方的“迫降失败说”，两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坊间长期流传的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文称：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号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带着大火进行迫降，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19）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20）。王、吴文称，“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已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击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9月30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新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导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方的正

式声明，而是新闻报导），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30年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苏蒙方面击落256号飞机的新说法，以顾达寿为代表。顾称，“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21〕由于有国内高层知名人士早在顾的回忆录俄文版出版后，即对其类似言论不加分析地作过正面推介，〔22〕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读者大为困惑。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23〕

王年一与人合作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及《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在蒙方调查报告面前完全站不住脚。

（七）《调查报告》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

关于256号飞机上的“黑匣子”，长期备受关注，传说甚多。

“黑匣子”即航空飞行记录器或称飞行事故记录器，其实包含了两个独立部分，一为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专门记录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另一为语音记录器或称舱音记录器（CVR），专门记录驾驶舱及座舱内的各种声音。黑匣子具有极强的耐火、耐压、耐冲击、耐海水浸泡、抗磁干扰等能力，即使飞机已完全损毁，黑匣子内的记录数据亦能完好保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非黑匣子，并不具备黑匣子以上能力。此外，一般提及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如无特别交待，可能仅指FDR，但亦有可能既包括FDR，也包括CVR。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12月6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进口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1960年代中期生产、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过的三叉戟1E型中短程喷气式客机4架，分配给空三十四师作专机使用。1970年8月接收3架，编为250、252、254号，随后不久又接收1架，编为256号。同时，周恩来批准由英国直接进口三叉戟2E型17架，其中6架1973年分配予民航，其余11架分配予空三十四师。

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明确记载，三叉戟2E型飞机装有型号为PV726A的飞行数据记录器2个〔24〕。手册中记载的2个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并未明确。至于三叉戟1E型飞机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手册中未有记载。

最后没有上飞机走向死亡之旅的256号飞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承认，一旦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找到黑匣子后，获得其录取的信息，原则上要由飞机制造的国家进行，‘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录制信息的编码是经过加密的。”但“有的在购买飞机的时候，一并将黑匣子的密码买了过来。”〔25〕

康庭梓上述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至少部分不准确。其一，黑匣子由专业公司而非飞机制造厂商生产。所以，黑匣子信息解码应由黑匣子生产厂进行。其二，由于黑匣子自身并无解码功能，其储存的数据信息，需要通过地面重放设备将其释放出来。因此，要买回来的不是密码，而是解码设备。

据空三十四师有关机务人员称，三叉戟飞机无论是1E型或2E型，进口时均没有同时进口黑匣子解码设备，也没有进口黑匣子的维护、校验设备。故而，机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况、完好情况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26）

虽然256号飞机上是否有黑匣子（尤其是语音记录器）直至今日尚难有定论，但康庭梓“可想而知”、孙一先“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均认为它已被捷足先登的苏联人拿走了。

康庭梓称，“根据孙一先的回忆，我国使馆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的时间，是在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不止一次去过现场之后才赶到的。飞机坠毁的时间是9月13日凌晨2点30分，距我使馆人员15日下午奔赴现场，已经过去整整两天半的时间。到现场时，发现有些遗物已经被整理过，可想而知，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会留在现场。反映飞机失事原因的黑匣子也绝不会遗忘在现场。”（27）

孙一先则称，“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28）

康、孙两人以上说法，在《调查报告》中同样得不到印证和支持。更进一步说，对照《调查报告》，康、孙以上说法令人生疑。

先不要说苏联方面对坠机事件异常快速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即便256号飞机上确实有黑匣子，即便被苏方取走，基于苏蒙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苏方怎么也应将黑匣子的情况向蒙方通报，作为供蒙方高层内部使用的《调查报告》，似不可能不提及黑匣子可否解码的情况。然而，事实上，《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及黑匣子，不仅《调查报告》第二部分“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中，没有提及256号飞机安装有黑匣子，而且，在事故原因分析时，《调查报告》亦无只言片语是由黑匣子提供的。

（2019年8月）

1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1970年8月23日。中发〔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5日发至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军级。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页348—350。

3 “舰队”、“联合舰队”是林立果小圈子的代号。

4 B-52是美国空军一种亚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代号，这里用以指代毛泽东。

5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载中发〔197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4日发出。

6 中发〔1971〕7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1月14日发出。

7 乱命，悖谬的命令。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颖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颖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又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覆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十一回：“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进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并且失信直人，这等乱命，我尚可副署么？”

8 毛谈话详情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

9 应为张宏。

10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2月。高陶布等人职务据孙一先。

11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

12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50。

13 转引自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9。

14 指1971年9月下旬。

15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7。

16 [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1月，页78。

17 王海：《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页233—234。

18 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34。

19 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载《枫华园》特刊总第32期，2001年10月2日。

20 载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18）》，2002年1月21日。

21 [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页77—78。

22 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23 王年一、陈昭：《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载《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页470—471。

24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机务参谋业务手册》，1975年10月，页380—381。

25 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1。

26 访问包朝山记录，2016年1月11日。访问侯文仁记录，2016年1月13日。访问时念堂、梁金海记录，2016年1月12日。时念堂，时任空三十四师师长。梁金海，时任空三十四师工程部特设主任。

27 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4。

28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